

嘉定博物館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 嘉定博物館 編

張建華 陶繼明 主編

嘉定碑刻集

上

顧振東題四年九十晉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嘉定碑刻集 / 張建華, 陶繼明主編;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 嘉定博物館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25-6747-8

I. ①嘉… II. ①張… ②陶… ③嘉… ④嘉… III. ①碑刻—彙編—嘉定區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307968號

裝幀設計 何 暘

技術編輯 王建中

ISBN 978-7-5325-6747-8



嘉定碑刻集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 嘉定博物館 編

張建華 陶繼明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製版印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42.5 字數 2,800,000

印數 1-2,500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747-8/K.1686

定價 780.00元

《嘉定碑刻集》編纂委員會

委員

顧思明 方進元 湯惠明 朱德興 藺樂平 夏峰 張建華
陳啟宇 燕小明 楊軍 齊春明

主編

張建華 陶繼明

副主編

江漢洪 葛秋棟

學術顧問

朱瑞熙 夏咸淳

校注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光乾 江漢洪 朱懷興 朱瑞熙 宋懷常 沈習康 林介宇
姚奎榮 陳兆熊 徐征偉 陶繼明 夏咸淳 葛秋棟 慕穎
劉靜嫻 顧建清

工作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光乾 江漢洪 宋懷常 吳慶金 蓉金曉紅 姚奎榮
袁黛英 陶繼明 陳啟宇 孫培興 葛秋棟 張建華 郭正明
劉楚邕 劉靜嫻

本書為上海市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項目

前言

碑刻是歷史遺存、文化載體，是占據物理空間的以雕刻為表現手段的造型藝術，是綜合雕刻、書法、文學、歷史，集實用性、觀賞性與文獻性於一體的藝術作品，也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歷史資訊載體，被人們稱之為「刻在石頭上的史書」。

嘉定歷來崇文重教，文化底蘊深厚，是吳文化的重鎮。同時，嘉定也是碑刻十分豐富的地區，古往今來，嘉定的各種類型的碑刻的總量約有一千餘通。嘉定歷代地方志對碑刻均有記載，清光緒《嘉定縣志》專設《金石志》以記其盛，其中九成為碑刻。這些碑刻因戰亂、毀損及自然風化等因素，已消失散佚殆半，至今存碑近三百七十通（套），無碑而存拓片者二十六件，無碑而存碑文者四百餘篇，佚碑存目二百六十六條。這些碑刻數量眾多，品質高超上佳，內容廣泛，史料豐富，堪稱上海之最。其中有不少碑刻是受到歷代文人學者高度評價的名碑，而大多數碑刻書法雋秀，極富藝術價值。嘉定碑刻是「教化嘉定」的佐證，也是「教化嘉定」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嘉定的碑刻，其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賦稅、溝洫水利、文化教育、營建修繕、寺觀祠宇、功德傳記、園宅藝文、墓志墓表、佚碑存目等十大類，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堪稱洋洋大觀。

嘉定歷史上之所以產生如此眾多的碑刻，原因大致有四：其一，嘉定是有近八百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客觀上有樹碑立傳的社會基礎，碑刻的歷史可以追索到唐代；其二，嘉定歷代人文薈萃，書畫名家輩出，書丹刻石高手眾多，所用就近蘇州地區的青石質地精良，易於鐫刻，為碑刻的產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其三，嘉定文物古跡眾多，宗教文化興盛，加之嘉定人對縣內發生的大事有刻碑記之的傳統，使嘉定的碑刻日積月累，數量不斷增加；其四，嘉定歷代經濟繁榮，有較強

的財力能保證刻碑紀事、樹碑立傳得以實施。

嘉定存世的碑刻以嘉定孔廟為最多，其他則散見於秋霞圃、思賢堂、震川中學、吳興寺、錢氏宗祠等處。嘉定地區能存有如此眾多的碑刻，主要得益於嘉定人長期以來具有尊重傳統文化、保護傳統文化的良好風氣。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修葺嘉定孔廟時，就精心設計修建了一條長達四十餘米的碑廊；至八十年代，又在當湖書院東側修建了一條近四十米的碑廊。這兩條碑廊不僅收集了大量的碑刻，還為嘉定孔廟增添了一抹富於文化氣息的風景。在修建思賢堂時，文物工作者將碑刻的保護列為重要內容。在修建秋霞圃、震川中學時，又分別修建了碑廊、碑亭，將存碑集中安置，使之得以長期保存。在基本建設施工時，有識之士會特別留意地下是否藏有石碑，一旦發現就會報告有關管理部門。嘉定文博業單位經常受到熱心人士的捐贈。水滴成河、集腋成裘，嘉定的碑刻就這樣形成了今天的規模。

二

嘉定的碑刻中，社會政治類的碑刻有三十四通（篇）。其中最早的南宋《許浦增置左軍紀略》碑，是嘉定境內駐紮南宋水軍的重要記錄，說明嘉定當時處於南宋王朝的海防前線。明清時期，嘉定地方政府曾頒佈了許多法規，其中以整頓社會秩序的居多。當時，嘉定的市鎮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區域內南翔、清浦等市鎮，貨暢其流，繁華程度不亞於縣城。但隨之而來的是地方豪強和幫會勢力對市場的控制，而維持社會安定，保證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則是政府的重要職能。清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及康熙二十六年，嘉定知縣聞在上奉示而立的《嘉定縣嚴禁腳夫結黨橫行告示》碑及《永禁豪強霸占漁利告示》碑值得注意。當時對社會秩序影響最大的是腳夫和豪強。腳夫雖是市鎮底層勞力，但他們結黨為奸，欺行霸市，強行包攬市民的婚喪大事，惡意抬高價格，市民飽受其害。《嘉定縣嚴禁腳夫結黨橫行告示》碑打擊腳夫的氣焰，整頓了市鎮秩序，保證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同時豪強還霸占了境內幾乎全部河流漁塘，「插箔置簾，以專漁利」，致使漁民難以為生，引發了嚴重的社會衝突。知縣聞在上親自撰寫碑文，規定「一切各河各港，任漁民網捕資生，

以取天地自然之利，永禁豪強，不許霸占勒索」，保證了漁民的基本生存權，維持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這些碑刻集中反映了明清時期的社會風氣，還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經濟市場、社會組織和城市秩序。義莊碑刻是社會政治類碑刻值得關注的內容。嘉定的義莊碑刻大多產生於近代，較為著名的有《安定義莊碑記》、《曾氏瑞芝義莊記》、《嘉定顧氏承裕義莊碑記》、《南翔陳氏義莊記》等。義莊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就在他的故鄉蘇州吳縣天平山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義莊。義莊是農耕社會的產物，也是民間自助慈善機構。一個大族之中，必然有窮有富，富裕的拿出一定的田地來辦義莊，其田租專用於慈善目的，這是舊時的一種慈善事業。義莊之中包括學校、公田、祠堂等等設施。而在城市中，被稱為義莊的場所。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親自頒發了創導地方教化，維護社會穩定的《聖諭廣訓》十六條，其中第二條是「篤宗族以昭雍睦」，主張購置義田來贍養貧乏無依的人群。嘉定的義莊就大多建於清代中後期。義莊的申辦手續繁複，要經縣、府、道、布政司、巡撫等幾重衙門的審核，直至禮部最後批准，方可正式辦理。嘉定有經濟實力的名門望族紛紛出資創建義莊，對維護社會穩定，應對突發事件，協助政府賑災救災，舉辦慈善活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顧溶捐田二千三百二十畝，創辦承裕義莊，曾鑄捐田一千五百八十五畝，創辦瑞芝義莊，在嘉定民間產生過巨大的反響，對嘉定愛國愛鄉的精神培育，互助互幫風氣的養成，睦鄰友好、貧富和諧相處，產生過漸移默化的影響。

經濟賦稅類的碑刻共二十四通（篇），其中以圍繞「折漕」事件的居多，有九通。「漕」就是漕糧，俗稱皇糧，古代賦稅的一種，是地方政府必須上繳的實物稅種，當時規定嘉定須繳稻穀。明清之際，因種植棉花、紡紗織布比種植糧食有更高的利潤空間，加之海岸線向東延伸，嘉定的土地變為高亢地，宜棉不宜稻，九成的農田種植棉花，棉花種植和棉布生產已呈現出專業化的態勢，成為嘉定的經濟命脈。然而，由於只有一成的農田種植水稻，農民的口糧無法自足，吃糧要依靠周邊供給。而所繳漕糧農民們必須到鄰縣稻區購買，費時費錢，還要遭到中間商的殘酷盤剝，購得的糧價是原價的一倍。明代萬曆年間，嘉定農民不堪重負，紛紛逃往他鄉，或淪為豪強地主的家奴。嘉定民間首創「折漕為銀」之議，建議以銀

兩替代漕糧，把實物賦稅變成貨幣賦稅，以保住嘉定種植棉花及棉布生產的優勢。此議得到時任禮部尚書嘉定人徐學謨的傾力支持，孫元化、侯震暘、唐時升、李流芳、婁堅、侯峒曾、趙洪範、王泰際等人仕或在野的嘉定知識精英，幾乎都參與了折漕之事，前赴後繼，九死無悔。嘉定知縣中也有朱廷益、王福徵、韓浚、卓邁等人力挺折漕之事，折漕倡議最終獲得成功。為了紀念為折漕作出重大貢獻的有功之士，嘉定民衆特地在城西門外建造了「折漕報功祠」，為他們樹碑列傳。折漕碑成為嘉定碑刻中的一大特色，其中《嘉定縣永折漕糧奏疏並勒石緣由》碑，詳盡地記錄了明代萬曆時期震撼江南的折漕風波，此碑高二六五釐米、寬一七〇釐米、厚二八釐米，碑上刻五千三百五十個文字，體量之大，文字之多，堪稱上海碑刻之最。

文化教育類的碑刻共有一百一十通（篇），其數量僅次於寺觀祠宇類，是嘉定碑刻的又一大特色。它們分別記載了境內興辦修建縣學、書院、義塾、小學等各類學校的過程。其中有關於孔廟的達八十通之多，留下了大量有關嘉定孔廟的第一手史料。它們記錄了古代地方政府宣導教化、興辦學校的方針和措施，還有歷代修葺孔廟的記錄。其中立於宋紹定二年（二三九）的《嘉定縣學之記》碑，是關於嘉定辦學最早的記錄。碑文由時任知縣沈璞撰寫，詳細記述了嘉定孔廟創建之初的艱辛歷程，介紹了孔廟在當時的規模，孔廟內建築設施的基本功能。更難能可貴的是，碑文還記錄了嘉定首任知縣高衍孫在創縣之初百廢待舉，於經濟十分困難的狀況下，深謀遠慮地提出了「教化人民，培育人才」的治縣方針，為「教化嘉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辦學還離不開地方人士的熱心支持。立於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的《故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碑，記載了宋末元初的邑人王子昭兩次捐田給嘉定孔廟的事跡。他曾經當過學正的小官，為人樂善好施。這通碑記錄了他兩次向嘉定孔廟捐田共三千三百零二畝的豪舉，他將田定為「學田」，專門用於維修縣學，并供給莘莘學子的教育費用。孔廟當湖書院內，有一通著名學者錢大昕在清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撰寫的《當湖書院養士經費記》碑。書院是古代民間創辦的學校，書院日常維持的經費大多來自民間，需要民間熱心人士的資助，錢大昕在碑文中不厭其煩地一一介紹捐資人所捐的數量，其中有一次捐銀數百兩的鄉紳，也有捐資幾兩的老嫗。

營建修繕類碑刻共二十八通(篇)，其中記載修橋的占了大多數。另有築城、築山、修鐘樓、建育嬰堂等。這些碑刻反映了有識之士為民修橋築路、建立育嬰堂收養棄嬰等善事。值得注意的是首任嘉定知縣高衍孫的《創縣記》碑，記錄了這位先驅者在創縣之初的筭路藍縷和備嘗艱辛，留下了嘉定建縣的原始資料，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朱棣親自撰文的《御製寶山碑記》，則是嘉定航海史上的重要記錄，也是中國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獻記錄。

溝洫水利類碑刻共十通(篇)，其中以治理吳淞江的居多。嘉定係江南水鄉，湖河溝洫星羅密佈，因而歷來重視水利。吳淞江是流經嘉定境內的一條幹流，它為交通及灌溉提供了方便，但也易淤塞而引起水患。這些碑刻留下了歷代治理吳淞江的重要記錄。

寺觀祠宇類碑刻共一百三十三通(篇)，其數量僅次於墓志墓表類的碑刻。嘉定自古就是佛教及道教文化興盛之地，上海地區最早的寺廟就是嘉定菩提寺，南翔、曹王等地不僅因寺成鎮，而且地名就取自寺名。嘉定百姓崇佛成風，寺觀祠廟隨處可見，僅佛教寺廟就先後出現過四百八十餘所。嘉定境內菩提寺、南翔寺、護國寺、吳興寺、留光寺、圓通寺、大德寺、城隍廟、集仙宮、關帝廟等歷史悠久的著名古剎和祠宇達數十座。這些寺觀祠宇中有不少碑刻，或記載歷代信徒捐資修廟，或敘述這些寺觀祠廟的艱難的修建過程，或介紹這些寺觀祠宇的規模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為圓通寺三校堂所撰的《三校堂記》碑文，此文反映了元朝對儒、佛、道三教實施并存并尊的宗教政策，主張「為善之心，合其所以一，而忘其所以三；修其所以三，而敬其所以一」。碑文中表述的觀點，是元朝多元寬容的宗教政策的有力佐證，為元代史書少見。此文為《揭傒斯全集》所失載，其價值很高，內容也很重要。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有時為了商議族內的重要事務，也利用祠堂、義莊作為聚會場所，同時還兼有周濟宗族和賑災施粥的功能，是鬆散型的社會基層民間組織，對穩定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清時期，嘉定的許多名門望族和文化世家都設有祠堂，有的立碑記事，如李氏、錢氏、徐氏、黃氏、王氏等。碑中對祠堂的祭期、祭品、祭禮都有具體的規定，對今人瞭解古代社會有參考作用。

功德傳記類碑刻共四十四通（篇），以記載和歌頌歷代地方官員的政績為主，嘉定建有思賢堂存放其碑。明清時期，嘉定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文化昌盛，除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風尚外，還得益於地方官員的勤政和清廉。其中最有價值的有《前嘉定尹龍洪白三侯去思碑》、《前嘉定令省齋陳公遺愛碑》、《嘉定知縣王侯去思碑》、《柴侯去思碑》等，分別記錄和歌頌了龍晉、洪冕、白思明、柴紹勳等對嘉定地方有重大貢獻的知縣，他們在嘉定民衆中有較高的威望。他們的功德傳略，因具真實性，後來在編修嘉定地方志時被採用。此外，記錄元代文人顧阿瑛的《金粟道人小像石刻》，儘管內容不屬嘉定，但其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都較高。

園宅藝文類碑刻共四十一套（篇）。嘉定歷來多名人宅第和私家園林，據地方志書記載，嘉定歷史上曾先後出現過一百三十餘處私家園林和名人宅第，是嘉定人文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碑刻可以看作是有關嘉定園林的零星記錄。

藝術碑中有石刻畫像、名家書法作品，極富藝術性。有「宋四家」中黃庭堅法帖兩幅，筆力遒勁厚重，又不失瀟灑飄逸；書法家米芾的行書法帖兩幅，較為珍貴。明清時期的藝術碑數量更多，不勝枚舉。其中清高宗弘曆的《御賜張鵬翀南歸詩碑》，張鵬翀系雍正進士，號稱詩、書、畫「三絕」，得到弘曆的賞識，在張鵬翀省親南歸時，弘曆親筆題詩相贈。乾隆御筆，嘉定現僅存此一通。

墓志墓表類碑刻共二百九十三套（篇），數量衆多，居嘉定碑刻之首。墓志銘是記錄死者生平的一種碑刻，與死者同葬於墓穴中；墓表也記錄墓主的生平，置放於墓前。墓志和墓表所記載的墓主既有高官鄉紳，也有平民百姓。墓志墓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對研究嘉定的歷史人物、地理環境、社會風尚、經濟文化、氏族譜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嘉定最早出土的墓志銘可以追溯到唐代，今存唐代天祐四年（九〇七）的《唐故京兆宋府君墓志》蓋，但墓志銘已佚。宋代墓志銘有十六通，墓主大多為低級官吏和普通百姓。明清兩代的墓志墓表占了絕大多數。嘉定建縣後，由於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出現了一批名門望族和文化世家，按照當時的墓葬習俗，他們的家屬大都安葬於同一祖墳地，故出土的

墓志銘也較為同姓及配偶，呈家族化的傾向，較著名的有周氏、唐氏、瞿氏、張氏、李氏、王氏、陸氏等家族。墓志墓表是碑刻中視角較小的門類，但其內容卻是最本真、最細節，也是最生活化的，這些無聲的文字保存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的資訊，透過墓主的生平活動，往往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佚碑存目碑計二百六十六條。嘉定的碑刻歷代均有毀損，但歷代志書對其均有記載，尤以清光緒《嘉定縣志·金石志》為最詳。此次所收錄的佚碑存目，即以清光緒《嘉定縣志·金石志》為基礎，再加之清代和民國的鄉鎮志、民國《嘉定縣續志》、一九九二年版《嘉定縣志》及《秋霞圃志》所載的佚亡碑目，另有少量碑刻，雖碑體尚存，但毀損嚴重，且字跡漫漶，已無法辨認，也列入其中，計得二百六十六條。為完整展示嘉定碑刻全貌，也二列表收入本書最後，以備查考。

三

碑刻是十分重要的考古材料，碑刻所承載的歷史資訊往往最具原真性。因此，嘉定碑刻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它對研究嘉定的歷史演變、地理沿革、經濟發展、社會組織、地方風物、人文教化、家族變遷、人物事件等，可與傳世文獻、地方志乘相互考證，能補地方志的不足和闕失，為我們補史、證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正如錢大昕在《關中金石記敘》一文所言：「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輾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人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

《宋故周君知柔壙志》、《宋故孺人賜冠帔楊氏之壙銘》、《宋故周公必強壙志》、《宋故周公必強配耿孺人（道真）壙志》、《宋故訓武鈐轄周公（必進）壙志》、《宋故孺人鄭氏妙靜壙志》等六通壙志，係一九五九出土於嘉定西門。周氏係北宋時期嘉定建縣前的望族，周氏一門曾出過為數不少的級別較低的文武官員，嘉定的地方志書從未記載周氏的片言隻語。這六通壙志詳盡地記錄了周氏三代在經濟、生活、文化、信仰及家庭人口等方面的細節。碑文中有一「周氏為練溪望族」的文字，說明練祁（別稱「練溪」）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成地名，這些材料可補北宋時期嘉定地方史料的闕如。

《留光寺碑記》是嘉定現存最早的寺廟碑刻，碑文中所記錄的王八系嘉定建縣后的解元，但歷代縣志均未記載，此碑可補方志及嘉定科舉史的不足。

「折漕為銀」是嘉定歷史上最重要的賦稅改革運動，延綿二百餘年，無數志士仁人和有良知的嘉定地方官員為之奔走呼籲，他們不畏艱險，九死無悔，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二頁，但地方志礙於篇幅，對此事記載零星而簡單，語焉不詳，有的為志書所失載。而與折漕相關的九通碑刻則從不同的角度記錄了這個事件，提供了原始的細節材料，十分珍貴。其中《嘉定縣永折漕糧奏疏並勒石緣由》碑，更是記錄了自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至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這十五年中驚心動魄的折漕故事，記錄了民間人士徐行、瞿仁、吳應麟等首倡「折漕為銀」，從嘉定產棉多而產糧少的實際出發，大聲疾呼將實物賦稅改為貨幣賦稅，以減輕農民負擔。他們在時任嘉定知縣王福徵的鼎力支持下，「不憚數千里，匍匐籲天而請命」，為了地方經濟和百姓的利益，冒死赴京請願，終於感動朝廷，批准了嘉定折漕的動議。

《歸骨園記》碑則記錄了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天國運動發展到嘉定，清軍與太平軍在嘉定多次發生激戰，硝煙瀰漫的戰火中，人民流離失所，紛紛逃至上海租界，不少人饑寒交迫，貧病而亡，十分淒慘。戰後，地方善士集資赴上海收殮遺骸歸葬故土，碑文中記載數量達「一千六百有奇」，而清光緒《嘉定縣志》在記載此事時，僅以「餓死無算，多槁葬者」八字一筆帶過。凡此種種，不二而足，而碑刻的重要性由此而顯現。

嘉定碑刻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嘉定碑刻的學術研究價值早已被前人所發現，錢大昕和王鳴盛都曾編輯過嘉定碑刻的目錄，但在編纂清光緒《嘉定縣志》時「其書不概見」。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是一部研究金石的重要著作，內容宏富精湛，其中也涉及為數不少嘉定的碑刻。清代乾嘉學者中有人對嘉定碑刻作過系統的研究，有錢大昭的《嘉定金石文字記》、王述祖的《嘉定金石錄》等著作，可惜這兩部專著已亡佚。但歷代地方志均重視碑刻，記述較為詳盡，加之近年來發現和出土碑刻較多，為碑刻研究提供了新的門徑。

嘉定碑刻由於門類廣泛，數量眾多，可供學術研究的空間領域甚寬，而學術研究則是利用碑刻的終極目的。嘉定碑

刻數量多、門類廣，完全可以列舉若干專題，進行深度研究，而這些恰恰是為地方志書所忽略，或者限於當時的條件無法看到的。縣學、書院等碑是研究嘉定教育和儒家文化的重要史料；折漕碑是研究嘉定賦稅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史料；義莊、宗祠、育嬰堂等碑是研究嘉定慈善事業的重要史料；寺廟道觀的碑刻是研究佛教、道教在嘉定傳播的歷史；墓志銘是研究嘉定家族和人物的重要依據。如唐氏家族（唐時升家族）是嘉定的名門望族，唐氏的九通墓志銘，記載了這個家族從元代遷入嘉定後的世系和墓地變遷，這些材料為文獻中所缺失，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由乾隆金石學家王昶撰文，著名書法家伊秉綬書丹的《皇清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并序》，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碑文詳盡地敘述了錢大昕致力學術的一生，王昶後將碑文收入他的文集《春融堂集》時，易名為《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全文一千七百多字，修改達一百十字之多，下葬的日期由十二月初六，改為初十，並刪去了幾位交友，由此可以看出王昶初寫碑文時的倉促，以及他寫作態度的嚴謹；由嘉慶吏部尚書湯金鉉撰寫的《皇清欽授孝子例授承德郎晉贈奉直大夫鹽課司提舉輯庭王君墓志銘》，一通八方，記錄了清道光時期文盲、貧民王文瑞，以搓揉沙船繩索起家，勤勞致富，參加漕運，最終成為上海灘上朱、郁、沈、王四大沙船巨賈之一。王氏致富不忘本，樂善好施，惠助社會，注重後代教育，後成南翔地方的文化世家，出了王培生這樣的著名教育家，此碑為地方志書所失載，但對研究近代上海沙船業的興起及王氏家族均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嘉定碑刻具有一定藝術鑒賞價值，即使普通碑刻，其書法藝術水準也為今人難以逾越。而其中更有米芾、朱熹、趙孟頫、楊維禎、倪雲林、沈周、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婁堅、李流芳、王穉登、陳文述、錢坫、伊秉綬、浦文球、吳湖帆等著名文人學者、書畫藝術家的法帖和作品。這些法帖和作品中，有的雖非本人作品，系後人摹寫，但因接近原作，藝術水準仍然較高，是嘉定的藝術瑰寶。「宋四家」中黃庭堅的法帖，筆力遒勁厚重，又不失瀟灑飄逸；書法家米芾的行書法帖，較為珍貴；理學家朱熹所書的五幅《易經》大字碑，世所罕見。朱熹書法端莊縝密，氣韻生動，被人稱為「筆法險勁，精彩四射」。元代著名文人、書畫家趙孟頫撰書的《大報國圓通寺之記》碑，具有極高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趙孟頫

的碑文文采飛揚，書法圓潤勁拔；碑額由當時精於篆書的高麗國王璋所書，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錢大昕稱之為「嘉定之寶」。他還在《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設專章考證此碑。儘管後來寺破碑毀，今存拓片於嘉定博物館，仍依稀可見此碑當年的風采。《嘉定四先生小像暨真跡石刻》一組，為明代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四位著名文人學者的群像，他們都精於詩、文、書、畫、印，是明代嘉定文化的標杆。這組刻於清嘉慶年間的著名石刻，惟妙惟肖地再現了「嘉定四先生」瀟灑儒雅的風度，精、氣、神十足，而他們的書法手跡，則體現了各自不同的風格。著名抗清志士黃淳耀所臨的顏真卿書法帖上，有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題跋，可見在後人的心目中黃淳耀有多麼崇高的地位。衆多的碑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嘉定士紳、文人們的藝術趣味和審美愛好。

此次我們編撰這本《嘉定碑刻集》，旨在向讀者和專家提供盡可能完整的嘉定碑刻資料，使之成為嘉定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為研究嘉定提供重要門徑。同時，我們也希望大家通過查閱《嘉定碑刻集》，能更深入地瞭解嘉定、走近嘉定。

陶繼明

二〇一二年仲夏於古膠菖蒲書屋

凡例

一、本集收錄歷代立於或出土於嘉定轄境內的各類碑刻，時間下限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二、本集設社會政治、經濟賦稅、文化教育、溝洫水利、營建修繕、寺觀祠宇、功德傳記、園宅藝文、墓志墓表、佚碑存目等十編，各類編排均以立碑年代先後為序。其中《墓志墓表編》，部分以家族形式集中排序。

三、本集收錄的碑文，凡碑刻或拓本現存者，均另附圖片於碑文之前。

四、本集收錄的碑文，凡存世碑刻者，以存世碑刻為底本；碑佚而有拓本存世者，以拓本為底本；無碑、無拓本存世，而僅見之於歷代志書或文人別集者，以所錄文字最詳者為底本。既無碑刻或拓本，又未見碑文存世，但有碑刻目錄可稽者，收入「佚碑存目」，以備考。

五、本集收錄的碑文，凡底本漫漶難辨或缺損者，均以「□」標識，一字一「□」。若能查到漫漶、缺損字出處者，則一一補入「□」內，並在校注中注明出處；若依上下文推定者，以楷體補入「□」；若底本漫漶或缺損嚴重，上下文字難以計數者，則以「口……口」代之；若原文明顯訛誤者，則原字加圓括號，原字後加方括號注出正字。

六、本集收錄的碑文，凡涉及嘉定及與碑刻相關的人名、地名，有據可查的，一一注釋於碑文之後。對人們普遍認知的歷史名人、歷史地名，一般不作注釋。法帖一般不作注釋。

七、本集所收錄的碑文，若出現歷史紀年者，在正文中用（）括注公元年份。若一篇碑文中同一個年號多次出現者，只括注最先出現的年號，餘不復加注。同一碑文中同一人名、地名等多次出現者，也只注最先出現的一處。

八、本集收錄的碑刻、佚碑拓片，凡能標注者，其高、寬、厚及石質，碑文佈局、撰文、書丹、篆額、鐫刻者姓名，立碑、移碑、及出土的時間、地點等資料，記入該碑的首條校注。

九、對於嘉定轄境外流入嘉定的碑刻，凡具有一定歷史或藝術價值者，附錄於本集相應類別之後。